
文化、政治與經濟搓揉下的中國現代化

葉 啓 政

〈YEH Chi-Jeng, 國立台灣大學〉

就世界文明史的角度來看，與十九世紀的滿清中國一樣，當代中國推動所謂「現代化」，基本上乃是對十八世紀以來之西方啓蒙理性文明的一種反應。它所反應的不只是曾經發生在西方世界的種種現象，而且，也同時承擔了他們所提出來的問題意識。當然，中國人所做的反應是「中國式」的，也就是說，其反應乃是在既有的傳統文化模式與形式理路的支撐下而進行，因而，深受到中國社會既有的結構理路左右著。套句話來形容，情形即有如「西餐中吃」，這中間自然會因兩種文化所承載的基本理路不同而不免產生捍格的情形。這無形之中添增了一些特殊的問題，也在不同的人們之間衍生出一些不同的期待。

假若落實著肯定基本人權的自由民主法治體制是「現代化」所內涵（也是期待）之恒定不變的基本歷史內容的話，強調自由競爭與肯確私有財產權之正當性的資本主義做為主導的經濟體制，則只是一些特殊歷史條件所隨制而迸生的現象。就歷史發展的軌跡來看，它既是開啓了「現代化」的歷史序幕，也同時是「現代化」所欲弁證否定（甚至予以終結）之歷史階段性的現象。

准此立場來看，當中國政府當局以推動經濟層面的「改革開放」來做為確立「現代化」的基軸時，基本上即是把自啓蒙以來發生在西方世界之特定歷史哲學基調的弁證實踐過程接續過來。在1949年，中國共產黨扛著社會主義的旗幟遂行了馬剋思的預言，把當時中國所具之脆弱、且尚未「成熟」的資本主義一下子給摧毀掉了。依照馬剋思的理論。與之前的蘇聯一般，中國共產黨完成了在資本主義發達、且日趨「成熟」之西歐社會所未能完成的歷史發展階段，雖說這可能是早熟地提前完成了歷史弁證的過程。如今的「改革開放」似乎是把整個歷史弁證過程又倒轉過來，縱然這並非等於承認資本主義之底蘊的強韌，却至少或者是意味著希望走過資本主義的真正「成熟」期後再來證成社會主義的必然性，或甚至就是根本否認了馬剋思之歷史唯物弁證論的真實性，而向資本主義這個「老」體制靠攏，讓歷史就終結於此。顯然的，當中國重拾起西方的「現代化」來建構社會時，選擇了這個具歷史「隨制」特質之經濟面向的迂回倒轉發展路徑，而不是、也從未曾拿「現代化」概念所必然內涵之自由民主法治的政治體制來做為起點，是一項值得特別予以注意的理論性課題。

簡單來說，中國所以在1970年代的末期選擇經濟層面做為「現代化」的起點，甚至是全部，可以說是因應著已漸形成之「全球化」趨勢而來的。一方面，整個世界被資本主義的生產理路予以體系化的結構性壓力（特別是表現在經濟面向上）迫使中國不得不面對。這意味的，並不只是「社會主義乃是弁證否定資本主義的歷史形式」這樣的說法受到嚴重的挑戰，

因而，使得中國共產黨政權所賴以證成的正當性備受動搖。更值得注意的是，以一貫假政治權力由上而下地帶動變遷，如何在既有體制與借引體制所呈現兩套基本預設絕然不同的運作理路之間尋找一個適當的平衡點，將是未來必然要面對嚴峻考驗的根本課題。尤其，在威權體制下，經濟的「改革開放」乃是透過政治力來推動，如此以政治力來凌駕經濟力的「現代化」，基本上是不同於西方世界是由資產階級從下而上地來帶動「現代化」而呈現政治力與經濟力分離對衡的歷史場景的。相對於西方現代化乃開始於資產階級假「平等自由」的口號向既有的主導政治勢力爭取「公平正義」，現階段的中國現代化基本上却是始於政治與經濟勢力的大結合，或更恰當的說法，是政治滲透經濟，把後者納入其既有的運作理路之中。說來，這是中國傳統封建專制體制披帶上社會主義的名號所蘊生之運作理路的一種綜合體現。

然而，資本主義的歷史性格中內涵著古典自由主義的思想成份，這構成爲具強制性質的結構理路，它將勢必促使未來的中國社會面臨著政治民主化的問題，而這又是貫徹公平正義所必須考慮的基礎。在這樣的促逼過程之中，首先可能面臨的課題是經濟力如何從政治力中逐漸「解放」出來，以形成爲「獨立」的社會力。可以預期的，在這中間，以知識份子與中小企業主爲主形成的所謂中產階級，將扮演著相當重要的歷史角色。准此、且就整個歷史背景來看，當前中國的知識界會產生新自由主義與新左翼思想等等的論述，自是可以理解。

假若新自由主義與新左翼思想都可以看成是中國知識界爲中國之未來前途謀取出路的話，新自由主義乃是從改革變遷方向所期待（或內涵）的立場來切入，延續著主導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運行的主調理路，代表的是一種「理想反照性」的主張，而新左翼思想則是就既有的社會體制基礎來進行反思的工夫，採取的是二十世紀初期西歐資本主義社會之左翼思想家的基本思想架構，反映的是「現實修補性」的主張。然而，審視整個世界已進入「全球化」的大環境，特別是來自西方後現代社會之結構特徵的衝擊，中國社社會自然難以幸免。衝擊所及，因爲幅員廣闊、區域差異性大等等因素的作用，將導致中國社會（做爲一個整體）同時顯現出前現代、現代和後現代三種不同的心態。隨著發展的時序軌跡有所不同，這樣的分歧的心態基本上與地區有著一定的連帶關係。這意味著，做爲一個社會實體，整個中國並無法呈現出相同或甚至相近的發展步調。於是，區域彼此之間的「剝削」將勢必伴隨著階級之間的「剝削」而一並地呈現出來。同時，整個社會是否能夠尋求得一個共同期待的最大公約數，也將成爲明顯的問題。

凡此種種在在顯示著，在現代化的進程中，中國人所面對的問題至少應區分爲初期轉型、中期奠基、成熟蛻變等三個階段來討論。無論是自由主義做爲「理想反照性」的主張或左翼思想反映的「現實修補性」的主張，它們所牽涉的基本上都是「初期轉型」階段的問題，或頂多延伸到中期奠基階段。因此，不論是（新）自由主義或（新）左翼思想，它們本質上都是知識份子延續著西方的啓蒙理性精神，並因應中國的特殊國情，爲中國確立發展方向所提出的階段性「理想」主張。隨著中國進入更爲確定的發展途徑之後，一般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所期盼和感受之「平凡」的點點滴滴，將成爲一股具反撲能量的「民粹」力量，形塑出一種特殊的「大眾文化」而實際地導引著社會運轉著。換句話說，導引著社會運轉的主要力量不再是啓蒙時期以來以特定的社會理論（或歷史哲學）來帶動人們的實作行動，而是相反的

情形——大眾慣性的實作（與諸多廉價的期待）帶動著歷史的邁進。或許，就在這個時候，中國知識份子才真正地結束了他們長期來滿懷著「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歷史使命感，而把主導歷史的文化詮釋權交出來給平凡的「大眾」。基本上，這樣的發展趨勢正是民主體制發展到極致後的一個場景。中國社會會不會走上這樣的路子上去，或甚麼時候會走上，均有待做進一步的觀察。